

真如丛书
妙法莲华经

中国佛教文学论

杨曾文佛学文集



| 真如丛书 |

妙灵 主编

中國佛教史論

楊曾文佛學文集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佛教史论: 杨曾文文集/杨曾文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12

(真如丛书/妙灵主编)

ISBN 7-5004-3661-0

I. 中… II. 杨… III. 佛教史-中国-文集
IV. B94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8522 号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宗和

封面设计 王华

版式设计 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125 插 页 2

字 数 273 千字 印 数 1—3500 册

定 价 23.5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委会

主 编 妙 灵

副主编 圣 凯 黄夏年 刘元春

总 序

中国佛教从印度东传以来，在中华大地生根、发展，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至今绵延不绝。从东汉到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译经与格义佛教，是中国佛教的初扬时期，其结果是以某一经论为核心而形成了部分学派；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宗派大成的阶段，华严、天台、禅宗等宗派的形成，表明了印度佛教在理论思想上的全部中国化。而宋元之际的佛教，又以禅、净为主流，进入佛教中国化的鼎盛时期，在民间发生了全面影响。到了明代，圆融的思潮已经成为佛教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

清末民初，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回归印度佛教的思潮，以欧阳竟无、太虚大师为代表。今天，世界形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在呈现出多极化、全球化的趋势；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在思想、文化、学术之中，多元文化互相渗透，既有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又有东西文化的辩论，中国文化面临着转型与重组。古老的佛教在全球化浪潮中，如何继续传统、发扬光大，如何与时俱进，已经成为当今佛教界的最大课题。

历史早已说明，佛教的发展与弘扬，不可能超越于时代的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经济、学术之外。虽然 20 世纪的中国佛教曾经面临着西方文化以及政治、经济的巨大冲击，但是由于在—批高僧大德、檀那信众，以及社会人士的关心、支持和努力下，最终艰难地度过一个世纪，现在正在朝着健康的轨道上

运转。

佛教从来都是一个讲智慧的宗教，尤其重视智慧的解脱，在思想方面它曾经对中国文化作出巨大的贡献，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历代高僧大德、学士文人都非常看重义理的建设，他们撰述著作、注释经论，佛教的义理之学才得以发扬光大。从历代僧传的体例来说，“义解”排在“译经”之后，“习禅”、“明律”之前，可见学术研究在中国佛教里所占的重要地位。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由于受到欧美治学风气的影响，文献学、考据学、思想史、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被大量地使用，对佛教进行理性地分析，定性定量，促使了人们对佛教认识更加深入，但是这一形式，又使佛法的“义解”与近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有了一定的差异。

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工具，用来剖析佛教的历史与思想等等领域，扩大了佛教的知识面，更突显了佛教的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但是，佛法还有自己的宗教性与神圣性。学术研究利用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各种文献的比较研究，不断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资料，往往对佛法的理解上有其优越性。通过学术研究，使佛教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发展脉络更加清楚，提高了人们对佛法的认识。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学者本身就是社会的精英，对社会了解非常透彻，其思想观点往往能够补充僧界的不足；同时，他们作为佛教界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圆融转化佛教的思想，向社会表达佛教的看法，这些都是有益于社会与众生的活动。所以，加强佛教界与学术界的合作，对于推动佛教的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改革开放后，中国佛教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前些年佛教界一直忙着修复寺院、佛像开光、旅游接待，寺院呈现出游人如织、香火旺盛的现象。同时，由于教界人才的凋零，青黄不接，兴办佛学院成为中国佛教的一条出路。如今，二十年过去，

人才紧缺仍然是佛教界的最大困惑。如何培养人才、引进人才，是佛教发展在组织、制度建设上的重要课题。佛教文化与文化的佛教是一回事，佛教文化需要现代化人才，文化的佛教也在呼唤人才的到来，佛教在社会的普及程度、观感，社会大众对佛教的理解水平，关系到佛教未来的发展，显得至关重要。

真如寺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恢复重建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至今仍然有许多建筑需要修建。我主持真如寺以后，在政府有关部门、四众弟子的支持下，取得了一些有限的成果。但是，梵刹庄严，金像重光，只是一种外在的形象，佛教的发展需要更多的是文化内涵。由于这一点，真如寺在经济极其紧张的情况下，仍然非常重视文化建设，每周举办讲经活动、收藏名人书画、出版画册等等。

我于 1944 年出家，曾在上海佛学院读书，后来又在全国各大丛林参学。改革开放后，参与上海佛学院的工作，教书育人，一辈子都在从事着佛教文化教育事业。在寺务工作繁忙的情况下，我仍然坚持每周为信徒讲经，有时还到国内外从事一些弘法活动，闲暇之时，自己也写一些东西，文字因缘初衷不改，爱好佛教文化从未改变。

这次，圣凯法师、黄夏年先生有意组织一套佛教丛书出版，旨在推进佛教学术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我虽然已经年老，但是对于佛教文化之事，亦不敢推卸，只能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尽力促成此事。真如寺决定今后每年都将拿出一定的资金资助佛教研究的事业，帮助学者出版有关佛学著作，鼓励法师、学者集中精力从事学术研究，为的是将中国佛学推向世界。

本丛书的编辑方针是将佛教进行整体研究、契时而不过时，着重突出以下几个重点：

1. 原始资料的建设：包括藏外文献的整理，重要文献的校注，近现代佛教文献的整理出版。

2. 鼓励出版佛教研究的热点，同时加强资助目前中国佛教研究的薄弱点：如戒律、清规、礼仪等。

3. 南传佛教、藏传佛教。

4. 国外优秀佛学著作的翻译与出版。

发展佛教文化是一项长久的事业，需要巨大的恒心、愿心。真如寺一年资助四本书出版，数量虽不算多，但是如果长期坚持下来，经过十年、二十年乃至百年，亦可成洋洋大观矣！滴水归海而不失，佛教的发展正是由点滴事情做起。只要佛教界的高僧大德、四众弟子重视文化事业，专家、学者能够共襄盛事，佛教文化焉有不流传耶！

妙靈

2002年6月1日
于上海真如寺方丈室

自序

人一过五十岁，仿佛时间过得特别快，事情也就越来越感到做不完。

今年3月，我正在准备到台湾讲学的时候，黄夏年告诉我：上海真如寺资助出版佛教的著作，让我先提交个目录以备审议。不久，正式通知我提交约25万字左右的论文，以交付出版社出版。

关于这次出书，我与夏年交谈不多，对于事情的详细起始缘由不太了解。然而我认为这是好事。这使我联想起近年来佛教界热情地与学术界联合举办多次卓有成效的佛教学术会议，出版论文集；在中国佛学院学报《法源》、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年刊《佛学研究》之外，不少大的寺院相继组织出版具有相当水准的学术刊物，如《华林》、《觉群·学术论文集》、《中国禅学》、《曹溪》、《闽南佛学》、《戒幢佛学》等，为中国佛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发表园地，推进了中国佛教历史、理论和诸种佛教文化现象的研究，为繁荣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做出了贡献。

现在很多寺院在经济上已经解决日常“温饱”问题，有了剩余钱财，除保障寺院维修、扩建，改善周围环境，增设文教设施之外，还对社会的文教、环保、救济、公益等事业进行支援，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在“弘法”中“利生”，在“利生”中“弘法”，这不就是在实践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号召的人间佛教的理念吗？

笔者在 1994 年相继完成《日本佛教史》、《日本近现代佛教史》之后，着重研究中国禅宗史。1999 年出版了《唐五代禅宗史》，现正在撰写《宋元禅宗史》。在这期间，陆续发表了一些属于这两个专项课题的阶段性成果的论文，也因应请参加佛教学术会议临时撰写了若干专题论文。如果这些论文能够对读者提供参考，为从事有关佛教课题的研究提供一些线索和方便，笔者就会感到莫大的欣慰了。

最后，谨向上海真如寺的妙灵法师、各位常住，并向为编辑这本论文集付出艰辛劳动的圣凯法师、黄夏年同志、刘元春同志表示感谢。

2002 年 7 月 20 日于北京华威西里自宅

目 录

总序	(1)
自序	(1)
佛教中国化历程之回顾	
——纪念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年	(1)
佛教中国化的回顾与思考	
——中国古代佛教的三个问题	(16)
天台宗的史前期	
——从慧文到慧思	(37)
天台宗的创始人智顓及其著述	(56)
华严宗创始人法藏的“法界”观	(70)
澄观及其四法界论	(85)
唐代禅宗史上几个问题的考证	(106)
关于敦煌本《六祖坛经》中“无相戒”的考察	(125)
唐代宗密及其禅教会通论	(139)
临济义玄河北传法考	(159)
临济宗的门庭施設及其现代诠释	(173)
唐五代禅宗在今山西地区的传播	(189)
《唐同德寺无名和尚塔铭并序》的发现及其 学术价值	(209)
有关神会的两篇铭文	
——《神会塔铭》和《慧坚碑铭》的注释	(220)

弥勒信仰的民族化·····	(241)
道原及其《景德传灯录》·····	(253)
圆仁和日本天台宗·····	(276)
杨文会的日本真宗观	
——纪念金陵刻经处成立 130 周年·····	(289)
共书佛教“黄金纽带”的新篇章	
——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随笔录·····	(306)
为新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书新篇	
——中日佛教学术会议·····	(328)

佛教中国化历程之回顾

——纪念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年

公元前 6、5 世纪佛教发源于古印度，公元前 2 年传入中国，至今已经过了整整二千年。佛教传入中国时，中国早已进入发达的封建社会，拥有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包括道家、阴阳五行家以及“宗天法祖”的民族宗教传统、丰富多彩的民间信仰在内的意识形态。佛教在中国长期传播和向社会各个阶层深入普及的过程中，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宗教习俗的会通融合，逐渐演变为中华民族的宗教之一，并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历史文化发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本文借回顾佛教中国化历程的机会，就佛教的传入、佛教在适应中国社会环境中发展、佛教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概述笔者的一些想法。

一

印度佛教在公元前 3 世纪已经传播到印度周边国家，逐渐发展为世界性的宗教。大约在公元前 2 世纪及其以后，佛教伴随僧人和信奉佛教的商人、来自中南亚诸国的使者和移民沿着通贯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相继传到中国现在的新疆地区，然后经过玉门关、河西走廊传到内地，逐渐传播到全国，深入到民间。

到底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内地？在现存的历史文献记载中最有

影响的说法有两种：一是西汉末年的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一是东汉明帝永平年间。现在国际学术界一般采取第一种说法。

据《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裴松之注引三国魏鱼豢《魏略》记载：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使伊存口受《浮屠经》。

“博士”是学官，秦代开始设置，“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大概地位相当于县官。汉武帝提倡儒术，建元五年（公元前136）设置五经（《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博士；第二年正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扩大培养儒家人才，“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兴建太学作为传授学业之所（《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卷八十八〈儒林传〉等）。可见在汉代“博士弟子”就是跟随博士官学习五经的学生。浮屠，即佛陀；从《魏略》的介绍来看，《浮屠经》不是一部普通的佛经，当是讲释迦牟尼佛生平传说的经，如后来汉译的《本起经》、《本行经》之类的经。大月氏（或作大月支）原居中国敦煌、祁连山一带，公元前2世纪因被匈奴打败，被迫西迁，征服大夏，占领阿姆河、锡尔河流域，大约在公元1世纪建立贵霜王国，并将所占地域扩展到整个印度西北地区。此地及周围地区早在公元前3世纪已经信奉佛教，大月氏在迁徙到原大夏所居地方之后，很快就受当地风俗影响也信奉佛教。从公元前后中国与印度、西域的交通来看，《魏略》所记汉哀帝时大月氏使者向博士弟子口授佛经的说法是可信的。

然而从当时历史环境推察，佛教也许在此之前已经伴随移民、商人等传入内地，但是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五经博士弟子从大月氏使者受经，意味着一位儒者——知识分子从外国佛教

徒那里将第一部佛经接受并介绍到中国。这个事实展开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最早的一幕。此后，来自印度、西域的僧人在中国翻译大量佛经的过程中，也是得到汉族知识分子的密切协助。可以说，如果没有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的帮助，不仅没有汉译佛经的出世，也难以想像佛教在中国社会的广泛流传。

在此后的《世说新语·文学篇》刘孝标之注、《魏书·释老志》、《隋书·经籍志》等书中也有大月氏使者授经的记载，但受经的博士弟子之名或作“秦景宪”、或作“秦景”。然而在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二则谓：

哀帝世元寿年中景宪使于大月支国，受得《浮屠经》。

唐法琳《辨正论》卷六谓引《魏略》及《西域传》曰：

前汉哀帝时秦景使月氏，国王令太子口授于景，所以浮屠经教，前汉早行。

是说博士弟子景宪或秦景出使大月氏受经而归。这些记载晚出，是在佛、道二教辩论佛道先后与优劣的背景下将前引《魏略》的文字加以篡改而成的，是不可信的。

关于东汉明帝遣使求法说的最早记载是汉译《四十二章经序》。大意是说明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早晨问群臣所梦为何神，傅毅回答说：

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

于是派使者到大月支国抄写佛经《四十二章经》而归。东汉末年的牟子《理惑论》也有类似记载，但情节有所发展。

此后受佛、道二教斗争的影响，一些人出于某种需要把明帝遣使求法重加改编，又增添不少情节。一是有确定求法的时间，其中最有影响是《历代三宝记》卷二所记载的永平七年遣使，永平十年（67年）归国的说法。某些道教徒对此也有自己的说法，

例如西晋王浮伪造《老子化胡经》说明帝在永平七年（64年）遣使求法，永平十八年（71年）回归（《广弘明集》卷九载《笑道论》引）。二是增加迎请大月支僧人迦叶摩腾（或作摄摩腾）来华的情节，说使者用白马驮经及佛像而归。南齐王琰《冥祥记》（《法苑珠林》卷十三引）、梁慧皎《高僧传》卷一、《历代三宝记》卷二等的记载最有影响。

永平求法说在后赵王度上呈石虎的奏议中，在北魏太武帝取缔佛教的诏书、唐太宗的《三藏圣教序》以及在唐代韩愈上宪宗的《论佛骨表》等重要文献中也被作为历史事实反复引用，以此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这种说法之所以具有巨大影响，可能与所传说的佛教三宝（佛像、佛经、僧人）同时传入有关。

从当时历史背景考察，汉明帝求法说的基本情节还是不容轻易否定的。至于汉明帝何年派遣使者，使者是谁以及何年归国等细节，因为史书无征，可以阙疑。然而必须明确指出：这只是佛教向中国的进一步传播，而不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

《后汉书》卷四十二〈楚王英传〉记载，楚王刘英晚年“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65年）明帝下诏天下有死罪者可以用缣赎罪，刘英派人到国相（中央派驻封国主持政务者）献黄缣白纨赎罪。明帝得知，立即下诏：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按，男居士）、桑门（按，沙门）之盛饌。

诏书示意刘英没有罪，不必心怀不安，并退回黄缣白纨让他用来作供养居士、僧人之用。这说明，东汉明帝时佛教已经被作为黄老方术的一种得到社会上层的一部分人信奉，在一定范围流传，连皇帝也对佛教有所了解。

通过上述事实，以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作为佛

教传入中国的开始是比较妥当的。

二

佛教传入中国后，是在适应中国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当中传播和发展的。不适应就争取不到生存的空间，也就没有发展的可能和机遇；而如果只适应不求发展，就会失去佛教之所以是佛教的特点，必然失去自我存在的价值。佛教正是在适应中求得发展，在发展中不断适应的，在适应与发展的辩证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演变为中国民族的宗教的。

在中国古代，佛教在传播与发展中必须适应的社会环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 以皇帝为首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国家；

(二) 以儒家为正统的多元文化结构；

(三) 以汉族为主体的由多种民族组成的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如果不与这三个方面密切适应，必然难以立足，必然得不到发展。

历史证明，佛教以其教理的多样性和融摄性、行为规范的忍让和协和精神、处世应变的“智巧”（“方便”），善于将入世与出世、王法与佛法、戒律与伦理等相会通，因时因地作出适当的回应和解释，从而使佛教不仅能够不同的历史时刻和场合一次又一次地摆脱危机，而且能在与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的长期会通与结合中，逐渐发展为中国的富有鲜明民族特色的重要宗教之一。

下面对此举例略加说明。

东晋太尉桓玄曾下令整肃僧尼，设置僧籍，加强对佛教的管理。庐山慧远（334—416）在对此表示同意的同时提出补充，要求对能够如法修持禅定、读经学法、修建寺塔等做功德的僧尼予